

中国传统文化史

概论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SHI GAILUN

周晓光 裘士京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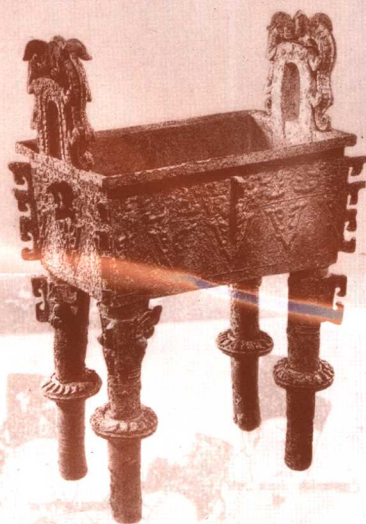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史

概论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SHI GAILUN

周晓光 裘士京 主编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文化史概论 / 周晓光, 裘士京主编.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81110-075-4
I. 中... II. ①周... ②裘... III. 文化史—中国—
高等学校—教材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2923 号

中国传统文化史概论

周晓光 裘士京 主编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联系电话 编辑部 0551-5108348
发行部 0551-5107716
电子信箱 ahdxcchs@mail. hf. ah. cn
责任编辑 谈 菁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110-075-4/G · 354

定价 25.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次

导 论	1
第一章 原始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10
第二章 先秦风华:传统文化的肇始	20
第一节 突破与初创:社会制度文化的演变	20
第二节 先秦哲学的艰辛历程与成就	24
第三节 文史艺术殿堂的初创	33
第四节 先秦时期的学校、教育及人才选拔	41
第五节 青铜时代的科技成就	46
第六节 市井情趣:平民社会的大众生活	55
第七节 大中华文化圈的孕育与形成	62
第三章 秦汉雄风:制度文化的新纪元	68
第一节 制度文化的构建与完善	68
第二节 儒学独尊与宗教	73
第三节 秦汉的文化艺术	79
第四节 秦汉的学校教育	86
第五节 渐趋成熟的传统科技	90
第六节 社会生活	100

2 中国传统文化史概论

第七节 文化交流与碰撞·····	104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变革与融合 ·····	109
第一节 从乱到治:制度文化的变化 ·····	109
第二节 无序世界里的纷乱与自由:宗教与哲学 ·····	112
第三节 乱世中的文学、史学及艺术 ·····	117
第四节 学校教育及九品中正制·····	125
第五节 传统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129
第六节 生活方式的多样性选择·····	133
第七节 文化的冲突与交流·····	138
第五章 隋唐五代:盛世风范 烂漫恢宏 ·····	142
第一节 制度文化的架构与创新·····	142
第二节 宗教和哲学的多元与激荡·····	146
第三节 文史艺术之恢宏壮丽·····	155
第四节 选举制度的历史性转折——科举取士·····	167
第五节 科技华光·····	170
第六节 社会百象·····	174
第七节 吸纳与辐射: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 ·····	178
第六章 两宋:适时应变 精致内敛 ·····	182
第一节 制度文化的适时应变·····	182
第二节 宗教与哲学的时代风貌·····	184
第三节 文史艺术的雅致与神韵·····	190
第四节 教育和科举的普及与开放·····	198
第五节 科技发展的高峰·····	201
第六节 宋人的风俗习惯·····	206
第七节 对外文化交流·····	210
第七章 辽夏金元:冲突震荡 汇聚交融 ·····	213
第一节 制度文化的震荡和更新·····	213
第二节 宗教与哲学的兴盛和发展·····	218
第三节 文史艺术的曲折发展·····	222

第四节 科技新篇章·····	230
第五节 空前开畅的文化交流格局·····	237
第八章 明清:气象万千 新旧杂存 ·····	244
第一节 制度文化的因循与专制·····	244
第二节 哲学新气象·····	249
第三节 文史艺术的绚丽风采·····	257
第四节 科举教育的畸形发展·····	265
第五节 科技新成就·····	268
第六节 “靡然向奢”的社会风气的形成·····	272
第七节 中华文化的自身融会与对外交流·····	277
主要参考书目 ·····	283
后 记 ·····	284

导 论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从上世纪末开始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研究的成果相当丰硕。从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看,全球意识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在破除了“欧洲中心论”以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西方学者和普通民众的青睐。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绚丽多彩,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伴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丰富,体系也不断地充实完善。在漫长的古代,中国传统文化曾像一座灯塔照亮了世界的东方,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对人类文明作出过举世公认的贡献。在我们全力以赴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如何正确地对待“传统与现代”,如何取其精华,剔除糟粕,发扬传统文化中生命力的内涵,继承中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不断地攫取和融摄中完善中国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中国传统文化史研究的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在往昔的沧桑岁月中创造、积累起来的文化宝藏,它记录着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展示了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博大精深。这是祖先留给我们后人,也是留给世界的丰厚遗产。

“文化”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一个词汇。成文于战国的《易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字最初是指纹理,以后逐步演绎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一步引申为典章制度、礼乐制度等人为加工、修饰、规范的内容。“天文”指天道自然规律,“人文”指人类规范社会的人伦秩序、道德规范,并以此来“化成天下”,即改造、教化天下。以人伦秩序教化世人,使之自觉按规范行动是中国早期“文化”的基本含义。随着历史的衍化,时代的进步,“文化”与许多学科的基本概念一样,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许多变化,其含义已相当的宽泛,据统计,各国学者对文化的定义可罗列一百多种。我们认为文化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创造,有了人才有文化,人类在改造

2 中国传统文化史概论

自然、认识社会和世界的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称之为“文化”。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文化主要指观念形态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属于上层建筑的复杂共同体,习惯上又称为精神文化。广义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及其创造的手段、规则、制度、习俗等,通常学者把广义文化规范为三部分内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从文化结构层次上看,三者呈金字塔形,物质文化处于文化结构的底层,制度文化处于文化结构的中层,精神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意识形态处于金字塔结构的上层。精神文化不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主导,它决定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方向,并在实践中转化为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

物质文化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基础,它是人们物质生产及其产品的总和,是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创造的物质成果。物质文化的特征是可感的、有形的,是以器物具体形态表现的文化,包括传统技艺文化、传统服饰文化、传统饮食文化、传统建筑文化等。制度文化是人们针对社会、改造社会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调节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制订的各种规范、准则、法律等,是以社会制度形式呈现的文化现象。具体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礼乐制度、法律制度、婚姻制度等等,还应包括约定俗成的习惯、礼俗、风俗,这些制度与礼俗时时刻刻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是整个传统文化系统的关键所在。人类社会通过适合时代发展规律的合理制度(其中首要的是政治制度),来保证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协调发展。精神文化是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它们对社会存在较为间接的反映,是经过提炼加工后形成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具体表现为哲学、法律、宗教、道德、信念等。

三种文化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有机体。这个有机体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运动轨迹就是传统文化的历史。概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史概论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进程为研究对象,它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的是中国文化的发展运动轨迹。世界各国的历史学都经历了一个研究领域逐渐扩大的过程,很长时期内,史学皆以政治史、军事史的内容为主,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等仅偶有记载,且大多过于简略。将史学扩大到文化史、经济史、科技史等领域是近二百年以来的事,在中国则是上世纪才刚刚开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必将日臻完善。

传统文化应该属于“广义文化”,它不只涵盖了哲学、文学、史学、教育、医

学、音乐、绘画、书法以及伦理、道德、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同时还包括诸如农业、手工业、商业、建筑、交通乃至饮食、服饰等外显或内隐的行为特征和现象。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以往各个历史时期中创造能力的积累和整合,它贯穿于中国人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渗透到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本书对物质文化的叙述仅限于社会生活层面(主要是饮食、服饰、居住、交通等),制度文化突出政治体制、教育制度、选举制度,精神文化着重于宗教、哲学、文学、史学、艺术等方面,此外,每一时期还安排专门的篇章叙述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中外或国内不同民族间)。

二、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生态环境

中国文明与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南亚印度文明在五六千年前大放异彩,文字的发明、金属工具的使用等一系列新事物的勃兴,使人类终于迈过野蛮时代而跨进文明时代的门槛。中国与这几个文明古国远隔万水千山,因而,中国文明的进程是在几乎完全独立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从此,在世界东方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创造出独具风格、绚丽多姿的古代文明,形成世界上仅见的延绵不绝、高峰迭起、不断推陈出新的文化系统。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发展、兴旺和延绵,有着与其他文明古国不相同的生态环境。

无论哪个民族或国家都离不开地理环境所提供的生存条件、活动舞台和发展基础。任何一种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都受某一民族或国家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三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中国文化当然不能例外。

中华民族栖息繁衍于相对闭塞的东亚大陆,大海、沙漠、高山等自然屏障,使东亚大陆与其他文明隔绝,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有广阔的回旋余地、适宜的气候、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一切构成了中华民族创造独具特色的历史与文化的基本因素。中国地理环境的另一个特点是地势西高东低,气候复杂多样,腹里纵深。高山、高原和大型内陆盆地主要分布在西部,构成西高东低、落差显著的地貌特征。中国处于北半球的温带——暖温带,南北两端的小部分地区深入热带和亚热带,大部分地区属温带、暖温带,气候适宜,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较为良好的外部环境。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更宜于人类的生活与生产,遂成为文明的发祥和繁盛之地。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大都崛起于北半球的相当纬度之内,所不同的是中华文明的滋生与繁衍不是仅仅依托于一个气候带,一条或两条流域有限的河流,而是扎根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个气候

带,气候、土壤等自然因素差异颇大,自然和人文的互补性强,文化面貌更加丰富多彩。多样性气候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多种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东部地区成为著名的农耕区,以秦岭—淮河为界,其北部形成了以小麦、粟、稷等为主要作物的旱地农业区;其南部则是以水稻为主要作物的水田农业区,西部和长城以北气候偏冷,雨量稀疏,自古即为游牧区。这些也是中国文化自发生之日起就呈现出多元性特征的原因。辽阔的疆域、复杂的地理环境不仅提供了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可能,而且为文化的交融和转移、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条件。

中国地理环境的上述特点是其他文明古国所不能比拟的,中国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建立在恢弘的地基之上,它幅员广大,腹里纵深,回旋余地大,经得起坎坷跌宕和大风大浪,形成了延绵不断而始终未曾中绝的特点。而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哈拉巴文化、美洲玛雅文化都曾经历过毁灭或为外来文化所取代。它们所创造的文化虽也曾光耀四方,却在后来被蒙上了阴影。

中国文化主要建立在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生产的土壤里,北起大兴安岭西坡,沿西辽河上游和燕山山脉,斜穿河套、长江上游,直抵雅鲁藏布江河谷,这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这条线为界,中国被划分为温湿的东南和干寒的西北两大区域。前者数千年来在农业经济发达的前提下,典章制度完备、文明昌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居于世界前列。后者除小块绿洲与河谷小平原的农业区外,民众多以游牧为生。一般而言,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处于较原始的阶段,文化程度低于农耕民族,往往具有强大的军事突破能力,攻城略地,甚至出现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君临中华数百年的局面。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各民族长期以迁徙、战争、互市、和亲为中介,彼此交往融合,互相取长补短,逐渐形成并不断丰富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斗争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全过程,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国文化。

农业被誉为文明之母。中国在夏商时期就形成了以农业立国的发展模式,战国时列国重本抑末,奖励耕战,确立了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的传统模式。秦汉以降,小农经济进一步发展。无论是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政权,抑或如元朝、清朝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都把农业立国作为国策。修建水利工程、刊行农书、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农业、推广农业新技术是历朝历代的大事。朝廷把劝课农桑、祈天求雨、祭祀社稷作为国家正常运转的象征。近代在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以前,中国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

文化是一种人类现象,而人类只有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方能创造并发展文化。中国古代社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依赖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伦

理观念而加以维系。高度重视伦理道德学说,并将伦理道德渗透到意识形态的各个分支中去,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去,这种现象直到近代才有所突破。究其原因,是因为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在中国长期保存并影响甚大。当人类向文明社会迈进时,发生了社会组织关系由血缘向地缘的转变,但各民族在转变的方式和程度上存在着差异。所谓宗法,是指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尊崇共同祖先以维系亲情,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次序以及宗族成员各种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宗法制源于原始社会父系家长制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属血缘联系,夏商时期这种关系基本保持,西周时与社会政治等级、社会权力密切交融,形成较完整的宗法制度。西周灭亡后,姬姓贵族血缘纽带攀联而成的统治体系土崩瓦解,秦汉以降,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官吏选拔以“贤贤”取代“亲亲”已成主流,军功、荐举、察举直至科举盛行,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世卿世禄制,但帝王继续仍由皇族血缘确定,嫡长子继位法长期延续,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人的国民性格、社会心理、伦理观念和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都与此有密切关系,并直接导向专制政体的早熟和长期延续。

宗法制度特别强调对祖先的崇拜,强调尊祖敬宗,宗族有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历代君主十分重视宗庙的营建,并将其与社稷并重,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王宫前左宗(太庙)右社(社稷坛)的建筑格局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在民间则普遍建有祠堂、家庙,为家族祭祖之地。中国家庭具有超稳定性,往往跨越朝代而不绝如缕,家族制度的基础就是宗法制度,它依赖祠堂、家族制度而得以维系,依族规而得以巩固。对祖宗的崇拜和对父的崇拜是一致的,并由此延伸为对“君”的崇敬,对家族、对家的热爱,则扩大为对国的忠诚,在中国“忠”、“孝”是相通的,对个人而言,忠孝不能两全时,忠为重,对国家则“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在家尽孝,在外尽忠。在组织结构方面,家庭一家族和国家具有共同性,都是以血亲—宗法关系来统领,存在着严格的父家长制,这就是所谓的“家国同构”,家族是家庭的扩大,国家则是家族的扩大和延伸。宗法制度特别注重血缘亲情,其继统法是血缘至上,且强调嫡庶分明,长幼有序。随着宗法观念的深化,国家成为家族化的国家,一系列维护宗法观念的信条、意识、规范成为人人必须遵循的法则。中国化的伦理道德逐渐与法律相并列而根深蒂固。在中世纪,许多国家和民族都以宗教作为维系社会公德的精神支柱,为信仰的差异和教义的冲突而不惜诉诸武力。中国却始终没有出现全社会的宗教狂热,也没有形成本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但中国的宗法意识和伦理道德学

说曾长期起着准宗教的作用。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特定的生态环境铸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特征,半封闭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中农业自然经济为主体以及宗法家族制度和专制政体等特点,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清晰显现,中外学者对此多有论述,可谓见仁见智。本书则是从最基本的几个方面来加以总结,这应该是绝大多数学者都赞同的。

第一,中国文化是世界上“连续性文化”的典范,具有延绵不绝、体系完备的特点。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生发展的,又始终未曾中断,其优良的合理的文化内核不断壮大,形成传统。在世界文明古国中,诸文明民族创造的文化大都经历过较大的起伏。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于两千年前遭毁灭性打击而趋于黯淡;曾雄踞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化被雅利安人摧毁;美奂绝伦的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也曾因外族入侵而毁灭殆尽;创造过绚丽多姿文明的玛雅文化也被掩埋于中美洲的丛林中。惟独中国文明是个例外。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农业—宗法社会具有坚韧的凝聚力量,伦理型范式具有强大的习惯势力,坚守自身传统和体系,使之不断调节发展轨迹,顺应时势变迁并吸纳其他文化精华而进步,因此,中国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延续性。其次,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传统,这一特征,使其越积越丰厚,文化的底蕴非常宽广,博大精深。由于历时久远,文化的各个门类分支成就斐然,体系完备。各文化门类的发展保持着完整连续的阶段性形态,这在世界文化史中是少见的。以史学为例,各朝各代在史学理论与方法、史学体例与编撰方法等方面均有变化;由编年体到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到数种体例并用;又如文学,先秦诗经、楚辞、散文、汉赋、魏晋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各代均有奇峰异境,各领风骚数百年。

第二,中国文化是以孝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完善而严密的宗法制度特别强调尊祖敬宗,尊重传统,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古代,中国文化的伦理型特征得到进一步强化。伦理道德教育人们把个人的品格修养和个人对社会的义务置于主要地位,强调人的伦理义务,子对父尽孝,妇对夫尽顺,兄对弟尽悌,弟子对师长尽敬,臣对君尽忠,整个社会形成惩恶扬善、仁爱忠孝、尊君重民的风气。相比之下,法律的作用和威力显得不那么突出。中国文化的各个分支都被伦理观念所支配,无不体现着孝亲、尊祖、敬宗、忠君等伦理性观念。中国哲学讲阴阳之道,从伦理上将男女、夫妇关系与政治上的君臣、治乱、兴衰相联系;文学上强调“教化”功能;史学“寓褒贬,别善恶”,“惩恶扬善”;教

育则“首孝悌，次见闻”。对传统极端尊重，往往具有保守知足、厚古薄今的一面，同时也使传统文化增强了延续力，文化的积淀越来越丰厚。统治阶级治国特别注重道德感化的威力，强调劝善惩恶、见贤思齐。这种“伦理型”文化教育人民为“理想”而献身，颂扬高尚的情操和名节。每当国家民族危机之际，总有一批志士仁人慷慨赴国难“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闻鸡起舞”的祖狄、不辱君命持节牧羊的苏武等等就是其中的典范，他们都曾从传统思想中吸取积极的思想营养，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尊祖敬宗，尊重传统的特点有利于文化的积淀。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崇尚务实和中庸协和的特征。在农业文明的熏陶下，逐渐培养出了中国人勤恳务实、吃苦耐劳、善于处理各种关系、调和矛盾的能力。务实是农人的基本特点，不务实则无以收获，在文化上自然强调实用，与生产生活直接有关的学科受重视而发达，如农学、天文学、医学等，人文科学方面如历史、文学、教育等，比实用更深层次的探求，纯科学性的幻想则很薄弱。中庸之道是以平和稳定为旨趣的农人和农业自然经济的产物。中庸尚调和，主平衡，反对走极端，提倡择两用中。中庸之道被认为是中国式的智慧特征，体现在政治上裁抑豪强、平均权力和田产，体现在文化上，则是在多种文化相汇时，能异中求同、求同存异。中国文化扎根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土壤，这对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农人注重实际，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中国古代圣哲一向提倡“君子务实”，久而久之民族性格重实际而黜于幻想。中国古代基于实用的农学、天文学、医学等都十分发达，而纯科学性的玄思却受到冷遇。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人事轻宗教、重现实轻来世的特点。中国农业民族务实的精神、务实的性格体现在许多方面，文化上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尤为重要。中国人虽然敬宗祭祖极为隆重，宗法制度极为严密，但对鬼神则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于古代宗教，中国文化兼收并蓄，在百余种曾经流传过的各式各样的宗教中，佛教与道教是古代中国宗教的主体。与许多地区和国家不同的是，宗教并没有主宰中国的一切，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全社会的宗教狂热，纯宗教性的冲突和战争几乎没有发生过。中国的宗法意识和伦理道德学说曾长期起着准宗教的作用，“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时有体现。在文明发展史上，宗教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它促进了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但彼此不相容的某些宗教相互攻讦，彼此仇视，乃至兵戎相见，血流成河的现象史不绝载，由此而造成的破坏、灾难和毁灭也是司空见惯的。

第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它包容性很强，既个性突出，又广

收兼蓄,既强调传统,又不乏创新开拓精神。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交往中,通过迁徙、和亲、互市等方式,互摄互补,彼此交融。中国历史上不仅有汉族贵族建立的政权,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历史上,除通过“互市”、“榷市”等进行物资交换外,还通过相互间的贡纳和回赐方式以满足双方的经济需要,马匹和其他畜产品成为农耕经济的重要补充,而粮食、丝绸、布匹和茶叶又为游牧民族所必需,这种经济上的交换,不仅数量大,而且达到互相依赖的程度。工艺和技术、思想和文化方面的传播与交流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农耕人和游牧人共同创造的。中国文化在古代长期领先于周边地区和国家,中国文化中的精髓,如汉字、儒学经典、典章制度、礼法制度以及农业手工业技艺等都曾久远地影响周边地区,东亚与东南亚许多国家都被纳入“汉字文化圈”或“汉文化圈”的范畴(又称儒学文化圈),这种文化上的“高势位”并不影响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吸收,这种吸收不仅是有选择的,而且将被改造为中国式的。同时对外来文化具有宽厚的受容性,故能及时地吸收为我所用,而不至于为外来文化所同化。

我们应该看到,恋土重迁的生活方式和习性,尊重祖先传统的思维模式,使农人习惯于在小片土地上周而复始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追求生活的稳定和安定。就文化心态而言,文人学士所向往和颂扬的多是对和平宁静的田园式生活的企望,歌颂孝慈仁爱,鞭笞暴虐苛政,反对穷兵黩武。容易滋生强烈的本位文化精神,对本民族所固有的文化守而勿失,以不变应万变,难以产生强烈的创新和开拓欲望,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久而久之,难免滋长盲目自大、自我陶醉的思想,甚至孤芳自赏、夜郎自大,进而导致闭关锁国、自我禁锢局面的出现,这也是一个泱泱文明大国到近代终于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代中国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突而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在自己的社会内在发展中走向近代化,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引起了巨变。由于两种文化的模式和形态截然不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时而表现得特别激烈。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从创建共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文化的冲突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泛、影响也更深刻。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也由抗拒、盲目反对发展为“师夷长技”,进而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再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先进的中国人为之探索奋斗了一百多年,才在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中找到一条比较正确的路。中国近代文化的核心是科学和民主,这是“五四”时期提出的口号,是长期思想启蒙对封建文化的荡涤、对新思想吸收传播的结果,科学、民主这两面大旗至今仍需要我们高高举起。中国近代文化的发生发

展是被动的,是在遭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在西方列强枪炮的威胁下被迫应战接受的。从最初的“师夷制夷”到提出以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再进一步提出改造社会、“陶铸国魂”、“改造国民性”、变革社会是近代文化发展的必然。在被侵略受亡国灭种威胁的中国近代,其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在一起。因此近代文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特点。从整体上说近代文化比古代文化丰富复杂,但又肤浅、粗糙,没有完整的体系。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得到公认的有着悠久传统文化的国度并不多,中国当之无愧。中国文化是世界几大原生文化之一,它独立起源时间之早,文明发达之盛,延续年代之绵长,对周边文化的影响之久远,都是其他文明古国所不能比拟的。在漫长的历史衍化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包括制度、器用、思想、观念、农业与手工业技艺、汉字、儒学、律令、中国化佛教等方面几乎无一不对周边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东亚、南亚的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毫无争议地被纳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或称“儒学文化圈”)范围之中。中原王朝与周边方国,还有更荒远的地区和国家建立起臣服或贡纳的关系,他们与中原交往并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汉代开通“丝绸之路”,从此中西交通日盛,使者相望于道,中国文化传播到中亚、西亚,并通过它们进一部西传北播,中国的丝、丝织品、钢铁等物品以及冶炼铸造、掘井开河、农业耕作、纺织丝麻、瓷器烧制等工艺技术西传;中亚、西亚、南欧的农、畜、手工艺品也传入中原。这种联系和相互影响断断续续绵延了两千余年。唐宋以后,中国先进的造纸、纸币、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制造术等传至西方,为西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为资本主义战胜封建制度提供了武器。马克思曾对中国的这些创造和贡献,作过总体性的精辟论述。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还不止四大发明,仅在制度层面,中国的官吏制度、考试制度、俸禄制度、兵制、岁时历法制度(包括天文学和阴阳历法)、赋役制度,甚至货币、度量衡制度都对西方产生过影响;在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的众多方面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崛起提供了便利和必要的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的上述特点形成于数千年的漫长岁月,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在近代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虽不断在变化,但仍将影响当今和未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不论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只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加以改造和消化吸收,定能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

第一章 原始社会——中国 传统文化的源头

文化是人类有意识的创造,自从有了人,也就有了文化,开始了人类的历史。中国文化的最初历程是在原始社会度过的。这里所说的原始社会指的是从人类诞生之日起,至文明曙光初现的夏代止。原始社会被称为人类的“摇篮期”,它的时间跨度最长,占据了整个人类历史 99% 以上的时间,同时它又是人类历史中最艰难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祖先执著而坚定地向前跋涉,创造出悠远而质朴的原始文化,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一、中国人的起源和文化的源头

人类是怎样诞生的?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种种传说、猜测以神话的形式流传下来,不同的民族、地区可能有相同或相异的说法,于是有了中国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有了中国的“亚当”和“夏娃”——伏羲与女娲的传说;有了在一些民族中颇为流行的熊、猫、鸟等是人祖的猜测;在国外则有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创世说,有上帝创世说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人类对自身起源的探索。但是猜测和传说并不代表科学。人类起源的种种疑问需要靠正确思想指导下的科学发掘。现代考古资料表明,东亚大陆是古猿类、古人类化石的重要发现地之一。在中国的云南多次发现古人类的共同祖先——森林古猿、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的遗骸,自 20 世纪 20 年代末以来早期人类的遗物和化石屡被发现,为中国人的起源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发现有:安徽繁昌人字洞古人类活动遗址、重庆巫山人、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北京人、郧县人、和县人、广东马坝人、陕西大荔人、山西丁村人、许家窑人、广西柳江人、北京山顶洞人等,他们代表了从约二百万年前的早期猿人到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是古猿完成向人类演进的主要地区之一,是原始人类生活的重要摇篮。目前,在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原始时期古人类活动遗址遍布全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世界古人类和远古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人猿相揖别之时就是人类创造文化之始,最初的阶段是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度过的。从年代上来说,原始社会大致从距今两三百万年到公元前 21 世纪左右,占据了人类历史进程的绝大部分时间。处在襁褓中的人类,在不断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改造了自己,创造出了充满荒莽、淳朴与神秘气息的原始文化。

人类在劳动实践中不断增长才干,变得越来越聪明。劳动是人猿揖别的关键,是人区别于一切动物的根本特征。从人能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劳动开始,人类就脱离了一般动物的范畴。有明确意识地制造工具,使之帮助人类获取劳动果实、改善生存条件,也就开始了人类改造自然、创造财富、创造文化的新时代。只不过肇始阶段一切都显得非常简单。

原始人类最早制造的工具只能是对现有自然物的加工,这些自然物有木、骨、牙、石等,在漫长的岁月中,只有石质工具最易保存下来,考古学上将这段时期称之为旧石器时代。依石器制作的加工技术与精细程度,又有早、中、晚不同的分期,分别与人类体质的三个发展阶段相对应。在元谋人、蓝田人化石出土的地层中发现的石器制作技术简单,器形不规则,大多未经二次加工。北京人时期的石器已有进步,已稍作修整。到了村人阶段,类别分明,二次加工痕迹明显。到新人阶段,石器已较细小,可适应加工精美的装饰品、钻孔等需要。以山西峙峪人为例,发现的石器细小精致、类型清楚,且有小型雕刻器、石镞,表明可能已有弓箭。在许多骨片上有刻画的痕迹,使我们联想到“契木为文”的传说。工具的不断改进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折射出人类创造文化能力的提高。在使用木石工具的同时,人类很早就学会和掌握了火的使用。火的使用和保存既是一种技能,又可作为一种武器,从而提高了人类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当学会钻燧取火时,人类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一系列的进步改变了此前的原始群居状态,人类开始排除血缘婚配,向氏族社会过渡,从而大大促进了人类自身体质向更健康、更完善的方向发展。

当中石器时代作为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和兴盛的新石器时代的一支间奏曲而结束时,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我国母系氏族开始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此后人类明显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仅仅四五千年就迈入了文明社会。新石器时代又被称之为“新石器时代革命”,出现了以农业的发明与养畜业的出现、石器的磨制与钻孔以及陶器的烧制为标志的三大成就,人类改造自然、创造文化的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近百年来,中国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遍及现今中国领土的所有省区,其中比较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仰韶文化、河姆渡文